江南

随笔

草木江南，清明之味

孔戈碧

自南宋以来，江南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，食物之丰是一般地域难以相比的。不少外乡人耳熟能详的美食如杭州东坡肉、湖州周生记馄饨、无锡糖醋排骨、苏州太湖莼菜、常熟叫化鸡、南京盐水鸭、绍兴臭豆腐、上海生煎包等等，件件口味俱佳。乾隆皇帝六下江南，所到之处的民间小吃，皆为名扬天下的江南美食。但青团估计他肯定没吃过。因为青团在当时是属于时令的食物，不到清明节就没有口福享受。

四月清明，是上天的美意。繁花来临时，清明就来临了。风里，阳光里都是讯息。许多往事随着繁花从记忆里闪现，又因为繁花而落幕。风吹树叶，枝上摇曳的时候，你知道不止有赏花人，也有哀伤和思念的人。想念逝者，他们是空出的位置，与我们并行于斯。树梢之上，回荡着阳光与天空的明媚，那仿佛是上天的仁慈。倘若悲欢要来，就在此际来吧。

在二十四个节气中，唯有清明既是节气又是节日。清明最早只是一种节气的名称，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：“物至此，皆以洁齐而清明矣。”万物清洁而明净，草木青青，满眼的绿色，鸟鸣声里，春天正变得盛大，是古人出门踏青的好时节。清明节吃青团这种风俗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周朝。据《周礼》记载，当时有“仲春以木铎循火禁于国中”的法规，于是百姓煨炊，“寒食三日”。寒食期间的冷食，以米面制成者居多，枣糕是过为流行的食物。白居易有《寒食日过枣园店诗》：“寒食枣园店，春低杨柳枝。”可见唐代就很流行这种用面蒸成的枣糕了，有专门的店铺售卖。宋人还发出新意，用柳条将“飞燕形”的枣糕串挂起来，插于自家的门楣上，名为“子推燕”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·清明节》载：“寒食节前一日，谓之炊熟，用面造枣糕，柳条串之，插于门楣，谓之‘子推燕’。”

明郎瑛《七类修稿》卷四十三“馒头清白团”条谓：“古人寒食采桐叶，染成青色以祭，资阳气也，今变而为青白团子，乃此义也。”由此可知青团是由“染成青色”演变而来，到明代“变而为青白团子”了。《清嘉录》中对青团有更明确的解释：“市上卖青团熟藕，为祀先之品，皆可冷食。”明清以降，吴地清明风俗以青团诸物作寒具，此俗流传至今而不衰。随着传统节令的兴衰与变迁，寒食节逐渐消亡，并入清明节。再后来青团逐渐由节令食品变成了寻常美食。但它正式被称为青团，还是靠吃货袁枚，他在著名的《随园食单》中写道：“青糕、青团。捣青草为汁，和粉作糕团。色如碧玉”，从此这个名字就流传到现在。

青团主要原料大致可分为三种：艾草、鼠麴草和雀麦草（又名雀麦草）。盖浙北多以艾草为汁，浙南喜用鼠麴（又叫鼠曲），苏南、上海则艾草、雀麦草皆有。虽说不同植物有其独特的风味，但它们都能给人愉悦的青草香气。唯有捣一大捧绿，吃进嘴里，方不辜负这无边春色。

青团于江南流行最盛，各地都有吃青团的风俗，叫法又各有不同。上海、宁波叫青团或艾团，苏杭叫青团子或清明团子，湖州叫青圆子，衢州叫清明饼，金华叫清明果儿（月牙形的叫清明饺儿），台州则叫青饅，还有一些地方叫艾糍或艾叶粿。温州青团有别于其他地方，各地制青团多用艾草，而温州用的是棉（绵）菜，所以温州人又把青团叫做棉（绵）菜饼。棉菜系一种菊科植物，学名叫“鼠曲（菊）草”，别名清明草，佛耳草、棉花菜、米菜、黄花果等等。鼠麴草之“麴”字，据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里载：“麴，言其花黄如麴色，又可和米粉食也。鼠耳，言其叶形如鼠耳，又有白毛蒙茸似之。”……原野间甚多，二毛生苗，茎叶柔软，叶长寸许，白茸如鼠耳之毛，开小黄花成穗，结细子。楚人呼为米曲，北人呼为茸母。”皆是因为它的叶子与茎上都有白细的茸毛，并不刺手，只软乎乎地可爱罢了。

在温州，更当地味的叫法是“棉（绵）菜扁儿”。清明前，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后，江江河岸、山间地头仿佛

在一夜间猛然苏醒，满目葳蕤。野菜抖擞精神，迎来最好的季节，见缝插针地长出来，自顾自地在春天里葱茏着。也自有人随手采回家，水芹菜也罢，马兰头也罢，生拌也罢，清炒也罢，将春天的山清水秀一并吃下，安抚肠胃。清明前也是棉菜萌生最旺盛的时候，大多分布在山脚下、田野、溪边。但我之前却从未留意过它。这几年经常去爬山，看到有人提着篮子采摘，才知道吃了这么多年的棉菜饼是用它做原料。

在遍布光影的山坡，青草沉寂的低处，或一只鸟扑扇飞出的隐秘之处，独自体味着摘棉菜的乐趣。棉菜的叶子有一点厚度，又很柔软，淡绿上覆一层白色如同棉花丝般的毛。如果把它的叶子拉断，柔软的丝毛也会连着拉长。我喜欢把它握在手里，滑滑的，像春天里刚做完就忘记的一场梦。细想，可能喜欢的就是这“绵”，一种妥帖、温暖、春风般的质地，让你想到了那些未言之物。就像长春藤的枝叶，在日子里缠绕，许多美好的瞬间说不出。不过，有时候，这种美只是某些人领略到罢了。

将采摘的棉菜洗净晾干，用捣臼捣碎后放入米粉，然后加入适量的水，反复翻捣，直到棉菜全部均匀地融入到米粉中。棉菜饼做得好不好吃，里面放什么馅儿至关重要，温州最常见的馅儿是笋丁、豆腐干、三层肉、咸菜或萝卜丝，再放入虾皮和葱花。一个饼的

丰厚，眼看就要富贵沉沦了，得了笋和咸菜乡气朴素的咸鲜、脆甜，陡又精神旺盛，仿佛又变回了清白门户，踏踏实实耕读人家。包好以后在饼下面垫上一张柚子叶（也可用粽子叶代替），既防粘又多了一份柚子叶的清香，然后上蒸笼蒸熟。出笼后油绿如玉，清香扑鼻，让人忍不住想要趁热咬一口。吃了这饼，便是吃下了春天的颜色和味道，眼看着春光渐老，也没什么遗憾了。

年年清明，春生秋藏，渺渺光阴，悠悠远远，吃青团也是人们与时间的一个约定。对于从小吃到大的食物，总有一种割舍不掉的情结。青团的绿色是让人一见就会爱上的，以至于往而情深。

凡俗生活里生出的美和愉悦尤获我心，为此喜爱日本俳人小林一茶。他有两首俳句我一直记得：“我生的故乡，那儿的草，可以做饼哩！”“做饼的草，长青了哩，长青了哩！”在他那样悲苦的人生里，草饼仍是人生美妙的抚慰，一丝丝的甜津。字里行间那种近于喟叹的赞美，我如今却也只能微言得之。这露水的世，因为有些东西在，才使人可以忍受吧。

那些悄无声息的变化，是从哪一个时节的节点上开始的呢？没有人说得出来，往事如流水一般地消失了。突然想起这几年都是自己去菜市场买棉菜饼了。母亲在的时候，知我喜欢吃棉菜饼，每年这个时候总会买一些送给我，而我也习惯了她的馈赠。昏黄暮色中，眼泪还是流了下来。自高远处似乎传来轻微的叹息声，我等待着，仿佛等待着某个熟悉的声音降临，突然叫出我的名字。母亲终究是离我而去了。人心是不待风吹而自落的花啊，让人轻轻地垂下双手。唯草木永恒，在遗忘中，年复一年地疯长。每到清明，它必会用绿色安抚你，喂养你，让你相信，这就是上天的恩典。

仔细想来，若有一天在世上已然了无牵挂，对于时序节令的推移，我还是不能忘怀的罢。

好几年前，我来到杭城收藏家章胜贤的家中，一睹他的藏品。几十册，纸页发黄的线装账簿，平平整整地堆在章胜贤家的木楼梯上，封面上有“民国十九年春月吉立、方正大号、客庄号总”等字样。翻开一本，十六开的宣纸上，一列列毛笔写就的行楷，字迹鲜明如初——

“四日，收狮字五十一两，计洋二十元四角”；

“六日，收旗枪四十八斤，计洋一百零九元……”

一行行，一页页，仿佛回到80多年前的清明前后。山岚萦绕，雨意空濛，穿长袍马褂的茶商方冠三，正行走在龙井村泥泞的山路上，伙计肩上一担，是刚从当地茶农那儿收来的明前新茶。沉沉的箩担里的新茶，不消几日，就会寄到千里之外的北平去了。

一年的仲春，我走在龙井茶园，左手与右手都是一行一行的茶树，雨后茶园碧绿如洗，树影婆娑，远处山色空蒙，云雾缭绕。这样的茶园春色，真是令人欣喜。我想起自己家乡的茶山上，此时便有一丛丛的映山红点缀其间，细竹也会在茶园里生长，弯下腰身，能找到一根根橙黄肥胖的小野笋。茶山上鸟鸣啾啾，涧水潺潺，采茶的妇人三三两两地散落在绿影深处，嘻嘻哈哈地谈笑，手指翻飞，正在采茶。

杭州真是茶之宝地。它襟江带湖，一条波澜壮阔的钱塘江环抱杭州，一座清丽婉约的西湖落在胸前，一江与一湖，水气调和，给杭州的山山水水带来灵气与滋养。这里气候暖和湿润，四季分明，时常是和风细雨，朝云暮雨，群山之中的天然小气候，有利于生长出品质优异的茶叶。陆羽的《茶经》记载：“钱塘（茶）生天竺、灵隐二寺”、“杭州临安、於潜二县茶生天目山者与舒州同”。因之，杭州自古便是名茶产区。南宋时，杭州茶事兴盛，从寺院，到官庭，再到民间，茶礼仪已然成为体系，而名扬中外的径山茶礼，就是此时形成。

杭州名茶众多，明代13种名茶中，三种就产自杭州。其中最知名者，便有西湖龙井、余杭径山茶。龙井既是寺名，又是泉名，亦是茶名。龙井茶是苏东坡的好友辩才从天竺山带过来的，因为辩才落脚的地方有龙井寺和龙井泉，所以取名龙井茶。龙井茶背后神秘的传说更赋予其名满天下之誉。狮子峰有18棵御茶树，人们都愿去一睹真容，说起来，那些树也没有太大的不同，只因传说为乾隆皇帝手植的或是赐封的，龙井茶也因此有了一层隐贵的贵族皇权意味。

酒近侠，茶类隐。茶的历史，在中国源远流长。从西汉一直到隋唐，古人都是煮茶来饮，持续千年。到了初唐，人们开始讲究起喝茶的形式，有了煎茶，也有人尝试着在煎茶的同时，加入盐、姜等在料。到了宋代，饮茶又发生了变化，叫做点茶了。

唐代的煎茶道，复杂、高雅，只适合少数的文人墨客山林隐逸，五六个人在一起煮茶。而宋代把它简化，形成了点茶法。历史总是越来越简单的。到了明代，饮茶法又简化，成为煎茶法。茶道越来越简化，到了清代，就是泡茶了。

中国的博物馆里，有许多宝贝都与“茶”有关，比如宋代刘松年的《撵茶图》《茗园赌市图》，宋徽宗赵佶的《文会图》，元代赵孟頫的《斗茶图》等等。中国的茶文化，在宋代达到高峰，整个国家，上到皇室权贵、贤达文人，下至平民百姓，都以茶为时尚，以茶为风雅。

宋徽宗是一个奢华的帝王，但同时也是一名雅士，以诗文书画见长，偏好茗饮。他不仅画有珍品《文会图》，还著有《大观茶论》，此文洋洋洒洒3000字，对茶叶的地产、天时、采摘、蒸压、鉴别、碾压等都做了论述，而且见解独到。《斗茶图》的画者赵孟頫是宋代皇室的世孙，他在元朝为官，自然心中郁郁，便常借茗事以忘忧。《斗茶图》描绘的是宋代一个普通的市井百姓斗茶场景：画面上有四个人物，一个人手中拿着空碗，口中似有评说；另一人则一手提着茶壶，一手拿着茶杯，正欲品茶；还有一人正在注水入杯，一个人站在男人的身后，面前摆放着茶炉、水壶等用具。整个画面结构紧凑，动感鲜明，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。

如果我们穿越，返回到南宋时的临安城，便时常可在街巷看到这样的斗茶场面了。茶圣陆羽说，茶有五美，火之美、茶之美、味之美、器之美、境之美。所以斗茶，不仅要斗火、斗水、斗味，也要斗器、斗境。斗茶的人，少则三五人，多则十几人，类似于一个茶会，大家坐下来比赛，一边品茶，一边斗茶的色相与芳香度、茶汤香醇度、茶具的优劣、煮水火候的缓急等等，至于围观者众，就更添一分热闹了。

到南宋末年，禅宗的临济宗一派的点茶礼仪，被东渡僧从径山寺带到了日本。于是，日本有了茶道，它是我们南宋点茶法的一个分支。日本茶道，礼仪非常严格，也非常富有禅味，正是因为它来源于中国的临济宗。而今在杭州，茶的印迹随处可见。如果到周边的山里去走一走，除了看见漫山的茶园，亦可闻见新茶的悠香。龙井茶的炒制，是一门令人赏心悦目的技艺。我见过梅家坞的茶工炒茶，抖、带、搭、甩、捺、拓、扣、压、磨、推，号称十大手法，而在在我看来，仿佛是大极高手在施展绝妙武功，其手法之多变，气势之连贯，简直叫人叹为观止。新茶上来之后，春和景明的时光里，我们坐下来，泡上一杯茶，悠悠地喝起来，没有二话。

当我面对那一盏方正大茶庄的老账本时，看见的是旧时光延续至今的茶生意，茶生不息之意；当我行走在杭州春意盎然的茶山上，便觉得四处隐现的茶楼亦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了。作此春茶帖，与君共茗茗。

春茶帖

周华诚

▲▲清明时节于江南流行最盛的青团
春天的龙井茶园（视觉中国）

江南丘陵的春天里，丢下一粒籽，发了一颗芽

王汉英

“打猪草”是黄梅戏中的一场经典折子戏。在中国文学风雅颂的三层结构里，“打猪草”属于风的范畴。

中国之风来源于黄河和长江的两条河流。《诗经》是黄河岸边的桃花，而《打猪草》是长江村落田里的紫云英。前者夭夭，后者葱葱。

戏剧创作来源于江南丘陵地区极其常见的一幅乡村生态画卷，应该在早春，一位打猪草的少女在一户人家竹林“打猪草”，不小心碰断了两根竹笋，被该户一位读书的少年所见，要女孩陪笋，女孩一番哭闹，说打猪草的竹篮被男孩踩坏了，反过来要男孩陪……戏剧冲突特别简单，是乡村少男少女一次“意外”邂逅的纯游戏。

创作的立意、戏曲的旋律、冲突的线条、演员的舞台表演，十分简洁明快，甚至不需要舞台，乡村随意一个地方，或村庄或田埂都能作为“舞台”。戏剧真实，甚至“打猪草”的所有戏剧元素都能还原于真实的乡村元素，特别是“郎对花，姐对花”一段，所有元素采撷于乡村田野，是江南乡村民谣的原始之“风”。

“打猪草”的词来源于安徽安庆一带的民谣乡音。这乡音不能用“园林”承载，她就是一幅山水画，不适合汤显祖和曹雪芹，适合于王维、陶渊明和钱澄之。

“郎对花姐对花
一对对到田埂下
丢下一粒籽发了一颗芽
什么什么叶开的什么花
结的什么籽磨的什么粉
做的什么把”

这应该是江南丘陵春天里的一个日常故事。比如“老桐城”那个地方就

有句民谚，叫“穷不丢书，富不丢猪”。什么意思呢？老桐城人崇尚读书家风，家里再穷也要读书；富裕人家呢，家境再好也要养猪。老桐城（包括现今的枞阳一带）这地方很怪，以文章“甲天下”，像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文派三祖，强调桐城文脉为中国正统文脉，以“雅洁”为文章正统，方苞提出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，承载的是典型儒家精神，姚鼐编纂《古文辞类纂》，非儒家正统不编。桐城派在有清一代统治下，以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的精神居庙堂之上或去江湖之远，保持了高贵的文化人格精神。如“家文化”精神，是典型的儒家文化，“家”的汉字内涵是家里必须要有“豕”（猪），无书不称儒，无猪不成家。老桐城地域的风形成了特有的地域文化和经济结构，“读书和养猪”成了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。

“打猪草”的事发生在春天，刚好是青黄不接家庭口粮短缺之时，在乡村，人都吃不饱哪有粮食喂猪；而田野却是万物复苏，野草野花遍地生长，猪是杂草动物，叫孩子“打猪草”，可以节省大量粮食。

因此，“打猪草”是农家孩子一项

常见的农事活动。“打猪草”戏里的两个道具，一个竹筐，一把小铁铲，在农村每家都有，孩子外出“打猪草”这两样工具必备。田埂上许多野草必须用小铁铲，像野菜、野蒿、野芹菜，猪都喜欢吃，但一棵一棵地铲也特别费时，采满一篮子往往需要半天时间，小孩子贪玩，拿个空篮子出家门，几个小时回来打不了一篮子猪草，是要挨打。姐姐小时候打过猪草，我跟在她后面扯野花儿玩，还吃过甜甜的草桔梗，到了田野，孩子们容易撒欢，回家时篮子里的猪草少得可怜，我母亲也只是轻轻地责怪姐姐粗心，和我们隔壁一家的两个孩子可就不一样了，常为打不满一篮子的猪草挨打，我趴在窗子上看着隔壁，两个小孩子呆呆地在猪圈边，猪在哼哼唧唧拱着孩子的脚，也欺负他们。所以，农村不少小孩打猪草学会偷田里的“红花草”，红花草学名叫“紫云英”，在田里长成一片，特别茂盛，猪喜欢吃，女孩胆子小不敢偷，而调皮的男孩就经常把红花草偷个大大半篮，再在上面铲点野菜掩盖上，回家就是满满一篮子“猪草”。有了丰盛成果的男孩子，回家不仅得到大人的夸赞，还能吃

到一碗“三个鸡蛋炒米”。

“打猪草”戏里小男孩抓到小女孩在竹林偷“竹笋”，是男孩的一曲“损”戏。剧作者采风地在枞阳岳麓山朱光潜老家那一带。朱光潜老家的房子是三间小草房，前后有竹林。他的祖父朱海门是清朝贡生，父亲朱子香是晚清秀才。朱光潜的少年时代在严厉苛刻的父亲督促下只做两件事，一是读书，二是打猪草。他的父亲尽管是中国传统的旧文人，但却是一个非常胸怀的人。朱光潜的故居堂屋有朱子香亲手撰写的一副楹联“绿水青山任老夫逍遥岁月，欧风亚雨听诸儿扩展心胸”。在朱子香的眼里，朱光潜不能仅仅读私塾打猪草，还要经受“欧风和亚雨”。也正是在这种博大胸怀的熏陶下，朱光潜建构了中国美学史上的一座横跨古今、沟通中外的“桥梁”，成为我国当代最负盛名的美学大师。

朱光潜在《无言之美》里有一段重要的话谈到什么是“人”，什么是“猪”。他说：“我们所居的世界是最完美的，就因为它是最不完美的。这话表面看去，不通已极。但是实含有至理。假如世界是完美的，人类所过的生活——好比

一点，是神仙的生活，比坏一点，就是猪的生活——便呆板单调已极，因为倘若件事都尽美尽善了，自然没有希望发生，更没有努力奋斗的必要。人生最可乐的就是活动所生的感觉，就是奋斗成功而得的快慰。世界既完美，我们如何能尝创造成功的快慰？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，就在有缺陷，就在有希望的机会，有想做的田地。换句话说，世界有缺陷，可能性才大。”

他看待人生用的是“戏剧法”。他说，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，第一种方法里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，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儿玩；在第二种方法里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，袖手旁观人在那儿装腔作势。

说不定那年在自家竹林里抓到打猪草女孩偷竹笋的就是朱光潜。少年时，他在“打猪草”的前台，打猪草的女孩想回家给他“打鸡蛋炒米”吃，哪知少年胸中不仅是“茶麦花梦”“芝麻花梦”“石榴花梦”，还有一个“欧风亚雨梦”，一个带给数亿中国人美育的“美学梦”。

“郎对花姐对花
一对对到田埂下
丢下一粒籽发了一颗芽
什么什么叶开的什么花
结的什么籽磨的什么粉
做的什么把”

原来“打猪草”里唱的是花朵的对唱。朱光潜在北大上课时，眼光总是盯着天花板，极阳学音几十年没变过，听过黄梅戏的同学一下子找到了朱光潜的母语。在“打猪草”的旋律里，一位乡间老人在大地上“丢下一粒籽，发了一颗芽”。